



世纪文库

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钱存训 著

1
02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书于竹帛

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

钱存训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于竹帛/钱存训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3

(世纪文库)

ISBN 7-80678-471-3

I. 书... II. 钱... III. 图书史-中国

IV. G2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8295号

责任编辑 金良年 完颜绍元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装帧设计 陆智昌

书于竹帛
钱存训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35×965mm 1/16

印张 13.25

字数 215,000

版次 2006年3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678-471-3/G·46

定价 20.00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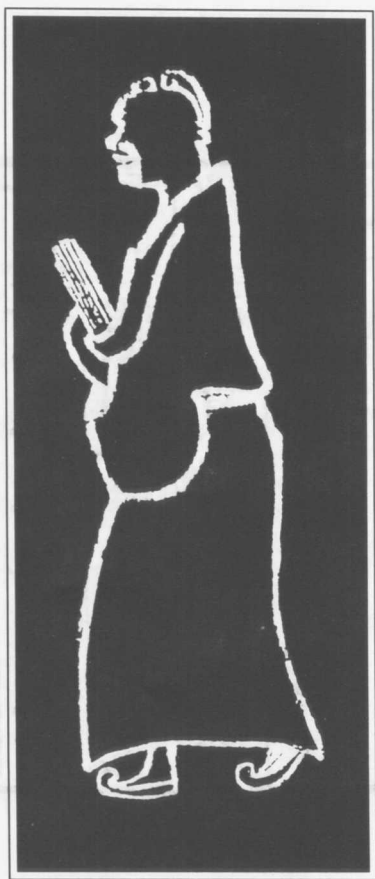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教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东汉墓砖“抱简图”

原砖现藏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博物馆

大墨子卷之四

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
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
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
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
孫者知之

本书版次说明

本书英文版原名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于1962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1963年及1969年两次重印，2002年增订再版。

中文本第一版根据周宁森博士译稿修订，定名《中国古代书史》，于197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再版。日文本由宇都木章、泽谷昭次教授等合译，题为《中国古代书籍史——竹帛に书す》，于1980年由东京法政大学出版。中文第二次增订本由郑如斯教授增补，改题《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于1987年由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用简体字横排出版。韩文本由金允子女士翻译，题名《中国古代书史》，内增印彩色图版15幅，于1990年由汉城东文选出版社出版，1999年再版。中文第三次增订本采用原题《书于竹帛》为书名，于1996年由台北汉美图书公司出版繁体字本。中文第四次增订本仍采用原题《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为书名，于2002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各本出版权为各出版社所有，不准翻印。如引用书中章节或图版，应取得出版社及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特此声明。

上海版新序

本书原以英文写作，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其后被译成中文、日文和韩文，并多次增订，分别以不同书名在国内外各地发行，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继1996年台北增订本出版后，最近又承上海友人盛情相助，再次增订，重版发行，同时英文原版亦已修订再版，使此书的生命得以再次延续更新，值得庆幸。

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出版经过，已在“写作缘起”及他处说明，不再重复。但是这书的一再修订重版，实受许多国际知名学者的评介所鼓励（见本书“后序”及“附录”）。他们的意见不仅增强了作者的自信，也使中国古代文化所具有的特色和贡献以及在世界文明中的应有地位得到肯定。

此书英文本出版之初，许倬云教授就为文表扬说：“这书是西文著述中至今惟一有系统介绍印刷发明前中国文字记载方式的书籍，可说凡是先民曾经著过一笔一划的东西莫不讨论到了。”他特别指出：“这书以印刷术之发明为断代标准，是一个真知灼见的决定。”稍后，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也认为：“从本书的性质与分量看，显然是卡特的经典之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一书的姊妹篇。”他说：“我们可以断言，钱著和卡特的名著完全可以媲美而并驾齐驱。……钱氏和卡特一样，全书行文清晰利落、要言不烦，是写作的典范。”李氏对此书的重视，导致他邀请作者参加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大系中《纸和印刷》分册的写作，成为此书的续编（原书名及译本见本书“绪论”注释[20]）。

另一位看重此书的学者是日本京都大学平冈武夫教授，他在日文本的序言中说：“中国文化，就是汉子的文化。……这部著述追源出土最古书写的文物，也追寻其后各时代汉字流变之踪迹，……可以说这是一

部由殷墟到敦煌这重要时代整个汉字书写的全部历史。”我曾在书中指出中国文字记录的延续、多产和广被性是世界文明中所独具的特色，他对此更加发挥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最多人使用的文字，是汉字！最广大地域使用的文字，是汉字！被使用最长久的文字，是汉字！表现最多种语言的文字，是汉字！蕴藏书籍最丰富的文字，也是汉字！”他的综合归纳，特别强调汉字的伟大，可在本书的“绪论”中获得详细的解释和确证。

中国古代的书籍和文字记录的多彩多姿、源远流长，是中国民族精神之所寄，也是世界文明中特有的奇迹。可是由于近代中国所受的外侮和屈辱，使中国人对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丧失自信而盲目自贬，甚至现在还有人认为废除汉字采用拼音是文字演进的规律和迎合世界的潮流，却没有深思汉字的特殊功能。假使没有汉字形体所独具的延续性和凝固性相维护而采用拼音文字，中国早已成为许多以方言立国而分崩离析的国家了。近代欧洲各民族以方言立国，足资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分久必合以及许多少数民族之能融入一个大家庭，汉字的优越性和融合性实不容忽视。本书虽非专论汉字功能之作，但对中国古代文字记录及其载体所传承的特色和重要性，都做了有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可供读者参考。

新版所增资料中，以近年出土的考古实物为主，尤其新发现在殷墟以外各地和周初的甲骨、战国及秦汉墓中出土的大批竹简、帛书和木质、丝质、纸质古地图以及敦煌遗书中最早的写本等较为重要，其他迄至2000年底所发现的考古资料也都加入正文或附注。另有芝加哥大学所藏汉代封泥及湖北云梦睡虎地战国秦墓出土竹简中所见的“纸”字，皆为他处所未及，也在增订本中略加介绍。结论中对中国文字书写的传统顺序，从上到下和自右至左排列的原因，前人都未加注意或解释其原因，作者就个人所见也在结论中试加推断，并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通行的各种文字阅读速度所作的比较研究，证明直行阅读实较横行阅读为快，希望读者注意。

此次上海版修订重印，多承复旦大学图书馆吴格先生倡议相助，中

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所长赐序，北京大学考古系宿白教授题签，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教授及彭柯同学盛情协助，钱孝文提供资料并相助排校，上海书店出版社有关编辑的精心编审，并得文锦及亲友多方鼓励、殷勤支持，谨表衷心的感谢。我对原书各章曾重加增改，文辞也略予修饰，图版亦有多幅更动，并另增入附录数篇，内有北大别立谦同学所编译《〈书于竹帛〉评介摘要》，使此书得以旧貌换新颜与读者相见，实是本书的幸运，也是作者的荣幸。

此书年前在台印行，承蒙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卢秀菊教授热心相助并指导排校，胡述兆教授热心支持，北京大学郑如斯教授相助增订，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题签，因上海版系根据台版修订而成，谨在此重申谢意。

在此书修订完成前，不幸有几位与本书有关亦师亦友的前辈先后凋谢，令人伤感。其中有我在大学时代聆听他讲授《中国书史》的刘国钧教授（1899—1995），当年指导此书写作的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前主任顾立雅教授（Herrlee G. Creel, 1905—1994）和夫人顾乐贞博士（Lorraine J. Creel, 1915—1995），图书馆学研究院前院长文格教授（Howard W. Winger, 1915—1995），鼓励我写作《纸和印刷》的英国剑桥大学前院长李约瑟博士（Joseph Needham, 1900—1995）和夫人鲁桂珍博士（Lu Gwei-djen, 1904—1992），以及翻译此书和另一册《纸と印刷》的日本山口大学泽谷昭次教授（1932—1995），以及阅读此书原稿的旧友吴光清博士（K. T. Wu, 1905—2000），他们对我的专业研究都曾有过重要的启发和帮助，谨以此书的新版表示对他们的深切怀念，并对他们在学术上的成就和贡献致以崇高的敬意。

钱存训

2002年新春于美国芝加哥海德国

李学勤序

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有几项重大的文物发现闻名于世，就是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这几项重大发现都各自导致一个专门学科的形成，即甲骨学、简牍学和敦煌学。同时，这几项重大发现又有其共同特点，它们均系古代的文字材料，因而对于中国古代书籍演变历史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很早便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如王国维先生在1912年，以大半年时间，四易其稿，著成《简牍检署考》一卷，主要依据新发见简牍实物与文献记述，互相印证，创获甚多，妙义纷呈。后来有不少学者追随王国维先生之后，寻绎探索，各有所得，使书籍发展的过程逐渐彰明。不过，他们的论作一般只涉及中国书籍历史的个别方面。将有关书籍历史文物众多方面综括贯通，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研究的，我认为惟有钱存训先生的这部名著《书于竹帛》。

我很早就知道钱存训先生这部书。1979年，我初次访问美国芝加哥大学，参观钱先生苦心孤诣经营多年的东亚图书馆，有幸拜见钱先生，蒙以此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相赠。大家知道，70年代国内各地陆续出土了大量简牍帛书，如临沂银雀山汉简、长沙马王堆帛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学者们当时正集中力量研究整理。我自1974年参加整理小组工作，细绎钱存训先生大著，实在获益匪浅，对这部书的博大精深，亦得有大略认识。

《书于竹帛》一书，英文初版印行于1962年，而其稿本则在1957年业已完成，迄今已逾40年了。钱先生就此书不断增补修订，出有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多种版本，风行学界，至今不衰。由于书的内容一直处于研究前沿，其对学人的帮助影响，可以说是历久弥新。揆其原因，我想是钱先生充分运用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物两方面的材料和研究，不仅说明中国古代书籍如何产生和演进，而且指出汉字的历史发展及其

重要作用，揭示了中国人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钱存训先生在本书的“绪论”中说：“中国文字记录的丰富、延续和普遍性是世界文化史上所独具的特色，没有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文献可以相比。中国古代典籍在质和质量方面的发展，更显示出古代中国在文化传播和学术研究上的辉煌成就。这些成果乃是中国文化的基石。因此要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承传的过程，主要便得从这些古代文字记录的遗产中去探索。换言之，要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制作、保存、传播和散佚的流绪，更需要从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背景中去研讨。”

钱先生特别标举“中国文字记录的一个重大特点，便是它独有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这一特点使得世界上一个有创造性的远古文化，得以继续绳绳，绵延至今。中国文字除了一般文字通有的音、义以外，还有其特殊的形体，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的文字，超越了时间上的变化和空间上的限制，团结了中华民族，更造成了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文化整体”。我相信，凡是读过《书于竹帛》的人，都会被这一意义重大的论断所感动。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可把这部书看成堆积短钉的材料书，更要仔细体会作者融贯于全书篇章中的根本精神。钱存训先生著述甚丰，据统计与《书于竹帛》主题有关的中英文著述有五十余种之多。列入李约瑟博士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纸和印刷》卷，更可与《书于竹帛》对看，此书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刘祖慰先生译本。最近，并有青年学者以探讨钱先生对中国书史研究的贡献撰成论文，在北京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实际上，钱先生书内有好多真知灼见，有待引申阐发，下面试举两个例子：

第一，书中第二章谈到已知甲骨文单字逾5000，其中仅1500多字可解，“有些学者认为，以此有限字汇，殷人不可能写出长篇作品。作者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因为甲骨文的字汇并不少于周代金文和长篇作品中所包含的字汇，而金文使用的时间却较甲骨文约长三倍。……贞卜文是一种特殊性质的记录，仅适用于某些特殊的场合，因之它所包含的字汇，只是整个文字中有限的一部分。换言之，殷人也一定写过较现

存甲骨文字为长的作品”。这一论点正确而且重要，足以表明《尚书》中一些“商书”和《诗经》中的《商颂》等文献，可能出自商代。

第二，第九章论及中国文字书写的传统顺序是从上到下、从右到左，“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和中国的文字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策，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策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劳榘先生于本书的“后序”里，引申了这个意见。1992年，法国东亚语言研究中心的游顺钊先生，在《中国语文》该年第2期上发表《古汉字书写纵向成因》，也独立地提出汉字书写顺序与使用竹简有关，还讨论了这一点和若干汉字形体纵变直接联系。这对研究汉字发展是有很大大意义的。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本书中真是不胜枚举。

最后想说一下，钱先生这部书的标题曾几次更易，原作《书于竹帛》，其后改称《中国古代书史》、《印刷发明前的中国书和文字记录》等等，窃以为还是《书于竹帛》最为恰当。此语源于先秦，文意古雅，突出体现了我国先民使伟大文化流传久远的独特创造，我们很高兴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新版恢复采用这一标题。

承钱先生不弃，允许我在《书于竹帛》新版卷首写几句话，极感荣幸，谨此以表敬意。

李学勤

1998年9月28日草于美国达默思大学

1999年4月5日改定于北京清华园

写作缘起

“书于竹帛”是一句表示古代典籍的成语，可以用来说明中国古代书籍演变的一段历史。自上古以至公元后数世纪的这一段时期，竹和帛乃是书写的主要材料。此书以之为主题，乃是因为与本书所述的范围正好相符；虽然书中除竹帛以外，对其他古代的书写材料亦加叙及。墨子曾说：“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中国古代的文化遗产，最初是依赖竹帛得以流传至今。

关于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演进，中外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但对于印刷术发明以前的书籍历史，尚少有系统的叙述。印刷术发明前的书史，时间比印刷史为长，而对探讨中国学术思想之渊源及传播，尤为重要。一般西方学者所写有关书籍通史，对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叙述，不是空白就是十分简略。对中国书籍演变的个别问题，中外学者虽然曾做过一些专深的研究，但是有系统的全面考察之作，迄今尚付阙如。因此，综合讨论中国古代典籍制度的专书，除了能作为一般学者修习图书目录学和书籍历史的参考外，也为研治中国文化史、科技史、考古学及情报信息等其他学科的专业研究者，提供中国古代文化传播和继承的信息。

研究中国书籍的演变，不可能不涉及铭文。《说文》：“著于竹帛谓之书。”铭文是指一般刻勒于金石等坚硬物体表面上的文字。铭刻虽然不能称为书籍，但这两种文字记录的方式并非不能互换。典籍记载常刻勒于金石，而铭文亦常转录于书籍之中。因此，本书对各种文字记录的源流及演变，都一并加以探讨，不论它们的形式是书籍还是铭刻。

自19世纪末叶以来，在中国境内外的古代遗址，先后发现了大批古代文字记录和书写的材料。特别是在最近数十年间，不少罕见的

古代典籍和书写工具先后出土，对研究中国书籍制度的演进，提供了不少重要的实物证据。本书即就现存文献资料和考古学上的实物，对中国古代典籍制度的起源和演变，做一综合性的研究。上自公元前14世纪，今日所见最早的中国文字起始，以迄公元700年左右，即印刷术发轫时期。这二千多年是中国文字记录和书籍发展的滥觞时代，所有的各种书写材料、内容、记载方法、编排，以及若干中国书籍所特有的形式，皆于此时期逐渐形成。印刷术发明以后，这些特色乃被继承，成为中国典籍和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印刷术的发明是书籍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它只是改变了生产的方法和增加了产量，至于书籍的实质、内容和形式，与采用印刷术以前都没有重大的分别。

本书首章，讨论中国古代文字记录的特色和重要性，及其演进的社会背景和学术因素。其后数章，分别叙述各个时代的主要文字载体，包括甲骨、青铜、陶器、玉石、简牍、缣帛和纸卷，详细讨论其内容、书体、制度及其特质。另有一章讨论各种书写工具的形式和演变。最后一章，总结以上各章所述要点，以通俗语言做概括性的阐释。本书的重点在考察铭刻和书籍之起源及其形体的演变，如材料、形式、技术、方法等。各种书写材料，都分别根据考古学和文献上的资料，详细研讨。至于各种古籍作品的作者、时代以及内容等问题，因属学术史的范围，本书虽偶亦述及，但未加深考。

本书根据的资料，主要是考古发掘报告、古物和铭刻的影本或拓本以及学者对这些古物的研究和阐释。在讨论各种书写材料及工具时多辅以实物图版，以佐说明。同时参用文献上的资料，以阐释或补充实物资料之不足，也间或引用训诂学上的解释，因为远古的象形字和会意字，常能表示物体的形态和反映当时的思想。

本书原以英文写作，题名 *Written on Bamboo and Silk: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Books and Inscriptions*，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列为“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丛书”之一。当初写作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使西方学者在研究世界图书发展史时，能对中国文化在这一

方面的贡献增加了解。当时，西方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兴趣，还没有普及到各个专题领域，同时这书的题材比较冷僻，因此出版社估计读者不多，销路有限。不料出版后受到各国学者的一致好评和推介（见本书附录四），三月之内第一版就已售完，不久又二次续印。最近更对全书重加增订，加入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所见新资料及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教授长序，将于 2002 年再版发行。

第一版英文本出版后不久，正文部分即由周宁森博士译成中文，嘱为校阅，迟迟未及完成。其间因全汉昇教授的敦促，选用书中译文几章，先后发表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开始受到中文读者的注意。1972 年夏间承芝加哥大学马泰来同学相助，将全部译稿加以修订，并补译前言、图表和附注，更将内容重加增删，补入 10 年来新发现的考古资料，又承澳洲国立大学巴纳（Noel Barnard）教授寄来长沙出土的楚帛书新摹本作为插图。全书复承劳榦（贞一）教授审阅一遍，写作后序，加以补充引申，使中文本的内容较见充实，也有好多论点和英文本不尽相同。修改完毕后，即采用董作宾先生以甲骨文所题的“中国古代书史”作为书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于 1975 年出版，因此这部书的中文本得与国内外的中文读者见面。

在中文本编订的同时，有几位日本学者也来信要求翻译，最后由宇都木章和泽谷昭次两位教授根据英文本着手日译，其后又得竹内信子和广濑洋子两位女士加入合作，并参考中文本再度增订，将迄至 1979 年止所见新资料加入附注，另编制“日文参考文献书目”和“事项、书名、人名索引”，又承京都大学平冈武夫教授写作长序，指出汉字的伟大和重要性，发人深省。继中文本出版之后，日文本即以《中国古代书籍史——竹帛に书す》为题，由东京法政大学出版社于 1980 年出版。

我曾在日文本的“序言”中说，这部书虽是概论性质，主要根据前人的各种专题研究成果加以系统地综合阐释，但其中也有不少个人的见解值得特别提出，如竹、木应用于书写的先后，篇、卷名称的考订，帛书的特殊用途，纸的起源新证，《说文》中“纸”字定义之诠释，以及